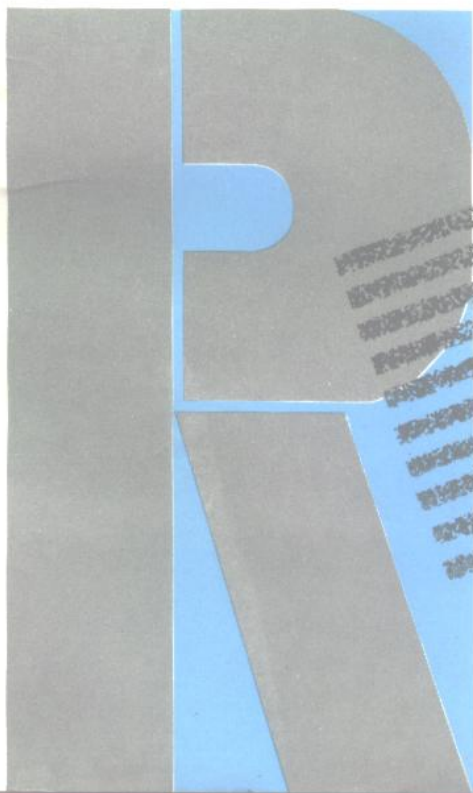


主体论

——新时代新体制呼唤的新人学

丰子义 孙承叔 王 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B038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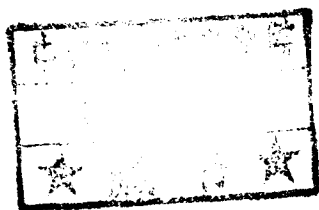
9623/10

88936

主 体 论

——新时代新体制呼唤的新人学

丰子义 孙承叔 王 东 著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新登字(京)15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体论：新时代新体制呼唤的新人学/丰子义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9

ISBN 7-301-02474-6

I. 主… II. 丰… III. ①主体-研究②本体论-研究

N. B016

出版者地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 政 编 码：100871

排 印 者：北京飞达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70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一版 199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1.90 元

目 录

导 言	(1)
-----------	-------

上篇 一般主体论

第一章 当代哲学研究的热点：主体问题	(19)
一、20 世纪哲学争论的基本问题	(19)
二、哲学的逻辑	(24)
三、时代的课题	(35)
第二章 主体性的探索轨迹	(41)
一、中国哲学对主体性的新近探索	(42)
二、近现代西方哲学对主体性的追寻	(45)
三、主体性探索的不同思路	(57)
第三章 主体性的新定义和新支点	(62)
一、主体性源泉：活动生成论	(63)
二、主体性根据——中介条件论	(65)
三、主体性本质——为我关系论	(70)
四、主体性含义——三重规定论	(74)
第四章 主体活动的三大系统	(82)
一、劳动实践系统	(82)
二、社会交往系统	(88)
三、语言符号系统	(97)
第五章 走向主体性与客观性的更高综合	(105)
一、20 世纪科学革命的焦点问题	(105)
二、主体知识库问题的凸现	(107)
三、主体性：人脑与电脑的根本分野	(111)
四、透视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新窗口	(117)

中篇 现代主体论

第六章 科技革命与现代主体劳动方式	(126)
一、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劳动方式的演变	(126)
二、科技革命对劳动方式主客体关系的变革	(130)
三、科技革命对劳动方式主体间关系的变革	(136)
四、科技革命与劳动方式的联动效应	(141)
第七章 全球问题与人的革命	(143)
一、全球问题的实质	(143)
二、人类困境的出路：人的革命	(147)
三、新的人与自然和谐观	(155)
第八章 主体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	(163)
一、社会现代化的启示录	(163)
二、现代人与传统人的分野	(167)
三、现代人的成长条件	(173)
四、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二难处理	(180)
第九章 人的生物前景与社会前景	(185)
一、研究人的方法论原则	(185)
二、从发展的观点看人	(191)
三、人的生物前景	(196)
四、人的社会前景	(201)
第十章 现代主体的发展趋势	(206)
一、考察现代主体发展趋势的立足点	(206)
二、现代主体的发展趋势	(209)
三、适应现代主体发展趋势的基本对策	(218)

下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主体论

第十一章 人的主体性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225)
一、社会主义主体问题的提出	(225)
二、观察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视角	(227)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体问题的实质	(231)
第十二章 新型市场经济与人的主体性	(233)
一、新型市场经济：弘扬人的主体性的宏观保证	(233)
二、主体性的人：新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239)
三、现代管理大趋势：企业主体性—人的主体性	(246)
第十三章 新型民主政治与人的主体性	(254)
一、人在不同政治体系中的方位	(254)
二、民主政治的支点	(258)
三、民主政治的萌发	(261)
四、民主政治的践行	(265)
五、民主政治建设与民主主体发展的同步原则	(268)
第十四章 新型精神文明与人的主体性	(273)
一、非上层建筑领域精神生产与社会发展	(275)
二、上层建筑领域精神生产与社会发展	(279)
三、遵循精神生产规律，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82)
第十五章 社会重组与主体活动创新	(288)
一、社会进化本质上是主体活动的创新	(288)
二、劳动要素重组	(293)
三、社会结构重组	(298)
四、社会运行机制重组	(302)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人权的发育与主体性的培育	(308)
一、人权产生和发展的前提	(308)
二、人权发育的基本途径	(313)
三、有关人权研究的几个问题	(318)
第十七章 社会发展与主体自身的全面发展	(329)
一、历史主体与历史进步标准	(329)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	(333)
三、改革与人的全面发展	(338)
后 记	(342)

导 言

人的命运和中国命运——这是当今世界与中国众多学人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本书的正副标题就明确地突出了我们写作此书的主旨：力图建立一门适应新时代、新体制的主体论——新人学。因为在人类迈向 21 世纪的历史征途中，决定人的命运和中国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就是以科技革命为先导的世界历史新型期的出现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体制的建立，这两大时代课题必然要汇聚到“人的革命”这个焦点问题上。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理论思维上的“人学革命”，提供一种理解人、把握人的新观念、新方式，以便适应新时代、新体制发展的需要。

理论的创新有赖于思路的革新。我们的“主体论—新人学”力求提出一种新的思路，扩展和深化主体论的研究。这种新思路主要体现在三大层次上：理论分析上，三维一体的系统综合法；总体结构上，三大主体论的逻辑上升法；研究方法上，跨文化跨学科的综合创新法。

一、三维一体的系统综合法

在对人的问题的理论分析上，我们主要采用了“主体活动——主体中介——为我关系”三维一体的研究方法，以同传统人学研究中的“以物观人”方法和“以心观人”方法相对立。

古今中外，研究人的方法，大体是这样三种：一是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方法，或者是科学解析方法，把人当作“自然人”、“机器人”，对其进行整体直观或原子解析。这种方法的实质，是

把人当成由若干原子细胞构成的物质实体，因而这种方法也可以叫“以物观人法”，即以物为镜，而观人性。二是唯心主义的抽象思辨方法，或者叫先验还原方法，把人看成一个“理性人”、“情感人”，对其进行理性思辨、抽象演绎。这种方法的实质，是把人只当成心灵世界构成的精神实体。这种方法也可叫做“以心观人法”，即以心为镜，而观人性。三是马克思开创的实践活动对象化方法，或者叫人的本质外化还原方法，把人当成“实践人”、“社会人”，认为人内在本质必然外化为实践活动、社会关系，因而把外在的感性的实践活动、社会关系作为映现人内在本质、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青年马克思的早期手稿道出了他的人学方法论真谛：“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①这种方法的实质，是把人首先看作是从事劳动活动的实践主体。因此，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为“以动观人法”，即以劳动实践活动为镜，而观人性。

应当充分肯定，马克思所运用的这种方法是一个伟大创造，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条独辟蹊径的创新之路，它从整体的高度根本超越了前两种传统人学研究方法。不过，应当看到，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关人学的研究远未得到长足的发展。那个时代的历史特征是：自近代以来，关于自然的科学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而关于人自我认识的科学则远未成形，直到19世纪中后期，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才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人类学四大分支；近代实验心理学是由德国人冯特在19世纪70年代创立的；现代语言学是由法国人索绪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创立的；对于人的交往活动的专门研究，则起步更晚，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直到 20 世纪中期以后,才由美国人霍曼斯和布劳提出了现代社会交换理论,德国人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伦理学,但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交往活动理论。

在走向 21 世纪的新起点上,以人自身为对象的人学科学群正在兴起,专门研究人的实践活动、交往活动、语言活动、符号活动、理解活动、价值活动、审美活动、信息加工活动等诸多学科方兴未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基点上,我们试图以马克思的实践论、主体论为立足点和思想起点,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对于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作出理论思维的更高综合,以开拓一条研究人的新思路——系统综合的人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要领是,对人的“主体活动——主体中介——主体关系”作三维结构的综合考察,从而再现活生生的“具体人”、“完整人”、“系统人”。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对立统一、综合创新;从外到内,内外结合;从物到心,心物结合;从动到静,动静结合。按照这种方法所建立的理论,主要有三大支点:主体活动论、主体中介论、主体关系论。

主体活动论。主体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正像物质的存在形式是运动一样,人的存在形式是活动。主体活动是人的主体性生长的内在根据,也是主体性发展的第一动因,它是主体性表现的现实舞台,又是主体性确证的历史明镜。主体性活动不是单一的,既不能简单归结为内在精神的心理活动,也不能单纯地归结为物质的实践活动,人的主体活动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复杂开放系统,其中有决定意义的是主体活动的三大基本形式: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语言符号活动。比较而言,劳动实践活动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主体活动,它使人从“自然人”走向“主体人”;社会交往活动则是劳动实践活动的伴生形式,它使人从“个体人”走向“社会人”;语言符号活动则是劳动实践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的内化与升华,它使人从“野蛮人”走向“文化

人”。劳动实践活动是人的主体活动的主导，社会交往活动和语言符号活动是其两翼；正是这种一体两翼，使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和高扬。其他一切形式的主体活动，包括选择活动与创造活动、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理解活动与解释活动、心理活动与审美活动、创作活动与评价活动，都是从这三大主体活动的根系中生长出来的。人的主体活动形式在其发展上，主要有内化与外化两大基本走向，由此决定人的存在形式也有两大层面：人的内外宇宙、内外世界、内外文化。所谓外化，主要是指在劳动实践等主体活动中人的内在本质、内在目的、内在精神、内在潜力的对象化、物化，创造出人化自然和属人世界；所谓内化，则是指在劳动实践、社会交往、语言符号等主体活动中，外部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转化为人自身的体质、能力、精神，升华出人所特有的主观世界、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从这样的意义说来，正是这些主体活动创造了人。

主体中介论。主体中介是人的主体活动的特殊工具、特殊手段和特殊形式。主体中介指的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间环节。从中国古代哲人荀子到西方近代哲学大师黑格尔，都把“善假于物”、“善用中介，以达目的”，作为人的理性之机巧，主体性之凭借。因为物质运动的方式是自在自为的，自发地相互作用，而主体活动则是人为的，主体往往要利用中介来强化自身并作用于客体。中介本身并不局限于人类文明初期的单个工具，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中介系统。工具操作系统、社会关系系统、语言符号系统，这三者综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人的主体活动所特有的三大中介系统。这三大中介系统是人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存在物，它们分别为劳动实践、社会交往、精神生产这些主体活动提供了现实手段。主体活动的外化与内化，作为同一条道路的两大走向，实际上都要借助于一个共同的手段，这就是主体活动的三大中介系统。这种系统具有分与合的两大功能：一是把人与自然、主体

与客体分开，实现“天人相分”；二是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走向“天人合一”。这一分一合，既走出了主客不分的原始状态，又超越了主客二分的二元格局。借中介以驭物，借中介以达标，借中介以驰骋，这就是主体中介系统在人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主体关系论。为我关系是人的主体关系的本质内容。所谓“为我关系”，是人在主体活动中借助于主体中介，以人自身为中心建构的普遍联系。为我关系包括从外到内、从大到小的三个关系圈：外层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圈，也叫“天人关系圈”；中间层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圈，也叫“人际关系圈”；内层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内在关系圈，也叫“身心关系圈”。为我关系中包含着对立统一的两种基本倾向：在天人关系中，存在着顺应与改造的双层关系；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着斗争与合作的双重关系；在身心关系中，存在着失衡与平衡两种趋向。正是这些矛盾与斗争，推动着主体问题的不断解决，推动主体不断走向进步。为我关系的本质之点，就在于人在主体活动中具有一种使自身活动、社会关系、活动客体都服从于自身目的、满足自身需要、达到自身利益的固有本性。不可否认，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人的主体地位会被扭曲变形，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会异化为以物为中心的社会关系。这种情况的出现，恰好说明人的本质不是孤立个人的抽象属性，而是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为我关系的实现，必须有赖于社会关系的真正解决。

“主体活动——主体中介——主体关系”，构成了一个新的范畴序列，为我们对人进行科学分析和系统综合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导向。

二、三大主体论的逻辑上升法

在主体论的总体结构上，我们提出了“一般主体论——现代

主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主体论”的总体框架，体现了一条在人学领域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本质进到现象的基本思路。这既超越了只谈论“抽象人”的思辨人学，也超越了只注重“具体人”的经验认识的实证人学。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注重解决理论体系的整体建构问题。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外在形式和叙述方式问题，而是一个决定其能否达到科学水准的根本问题。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问题，在古代萌芽状态的科学中并不突出，而在现代发达形态的理论科学中却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古代经验水平的科学认识中，理论前提和理论结论之间只有很短的距离，而在现代理论水平的科学认识中，理论前提和理论结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了，中介越来越多了。正因如此，从康德、黑格尔直到马克思、列宁，都把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作为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康德就曾指出：“建筑术乃是我们知识中关于构成学问之学说，因而必然成为方法论之一部分。”^①可以说，在现代科学认识中，衡量一门科学理论的成熟程度时，理论体系的总体结构比个别原理的表述方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人学体系也不例外。

从更高的视角来看，寻找一个科学的出发点，确立一个辩证思维的总体结构，对于人学或主体论科学体系来说，具有比其他实证科学、部门科学更为深远的意义。之所以如此，首先取决于人学、主体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人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一个最复杂、最不易把握的对象。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为了在理论思维中再现具体的人、现实的人，决不能从一望而即的直接表象或主观认定的先验原则出发，必须借助于理论思维的显微镜，透过人的种种表象，走

^①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65页。译文稍有改动。

向人的深处，走向人最深层、最基本的存在，以此作为思想出发点，然后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新的中介，不断扩展新的方面，最后再现完整的、现实的、系统的人。

要使主体论成为一个艺术整体，在整体结构上必须贯穿这样一系列基本原则：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的原则，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等等。正是将这些基本原则综合到一起，熔铸成“主体一般性——主体特殊性——主体个别性”的逻辑顺序，造就了本书上、中、下三篇的结构。

“一般主体论”是上篇，也是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一般主体论就是主体发生论、主体共性论。通过解剖最初细胞形态的一般人，为解析现代人、中国人提供一种理论分析工具。在一般主体论中，我们试图借助于科学抽象力，对人做显微镜下的理论解剖工作，作出系统分析：既对主体活动、主体中介、主体关系这些主体性外化的方面作出综合分析，又对主体能力、主体素质、主体个性等这些主体性内化的方面作出系统研究。通过这种内外结合的方法，试图做到分析与综合的更高统一，力求达到在具体思维中再现人的目的。

“现代主体论”是中篇，在主体论的体系中是逻辑的上升点。现代主体论相当于现代新人论、主体趋势论、人的前景论等。在这里，我们把理论视野移向当代世界，移向以现代科技革命为先导的世界历史新型期，移向人在当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我们一方面借助于一般主体论的理论分析工具，另一方面则立足于公元21世纪前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大走向，努力揭示出人在当代世界、未来世界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方向。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一方面进行了深层开掘，这就是深入到人的主体活动的最深层，从劳动方式的解剖中，引申出人的活动方式、存在方式、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从全球历史观、世界历史观出发发展开想象力的翅膀，捕捉未来的信息，粗线条式地勾勒出人的未来发展趋势与前景。现代主体论的核心思想，就是揭示新时代与新主体、现代化与现代人、全球问题与人的革命等的内在统一，并且把新型主体的塑造看作新时代的本质所在，把人的现代化看作社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把人的革命视为解决全球问题、走出人类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从一般主体论走向中国新型主体论的进程中，现代主体论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桥梁和逻辑中介，它给了我们一个思想上的阶梯，借以从世界史和现代人的大背景下，看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主体论”是下篇，它是逻辑上的归宿点，也是我们理论探索的主旨所在。在这里，我们以一般主体论、现代主体论为双层背景、双层铺垫，加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新型市场经济的具体分析，试图探索中国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的主体问题、人的问题。贯穿这里的一个核心观念，是体制与人的统一论：体制不是脱离人的空架子，而实质上是人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等社会关系的结构；体制改革不仅意味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而且意味着人的主体存在形态的根本变革。因此，必须克服僵化模式下国家垄断制、国家主体化的弊端，彻底调整国家、劳动集体（企业）、劳动者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广大劳动集体和劳动者都成为名符其实的能动主体。体制改革与主体重塑，乃是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真正主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统摄全局的指导思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为解决体制与人双重革新这个难题，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体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主体，都将在这块经济土壤中生根、长叶、开花、结果。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主体确立过程中，我们需要自觉地采取“宏观——微观”双线一体建构论：在宏观上，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精神文明作为三大支撑点，进行新型体制的整体建构；在微观上，以人的主体性——劳动主体性——企业主体性作为三大支柱，进行新型主体的重新塑造。就其归根结底的意义来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主体重塑，是人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乃至完整主体性的真正确立，是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教育。因此，我们必须着重解决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体制大目标与人的素质低水平的根本矛盾，把人的教育、主体重塑作为关系全局的关键环节。我们不仅需要把整个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而且需要在经济建设中大力重视人的教育。

三、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创新法

在人学和主体论的研究方法上，我们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出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努力超越古代哲学思辨型的人学、近代实证分析型的人学，走向综合创新型的人学。

所谓跨文化的综合创新，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点，吸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新成果加以综合创新。

创造新型主体论，不可能完全离开前人的思想基础，必须从前人的思想出发进行新的探索。主体性理论有哪些思想源头呢？总的来说，主要有这样三种：

第一个源头，就是西方哲学中占居主导地位的外向主体性思想。从古希腊的普罗塔戈拉、苏格拉底开始，一直到笛卡尔、康德，占据主流的主体性思潮主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一是思想重心放在外在超越的主体性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二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又重在强调征服关系、统治关系；三是趋向于把主体性主观化，脱离客观性来突出抽象的主体性；四是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独立个性，孤立地讲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体性。从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开始有所转折，从早期的胡塞尔、海

德格尔，到后期的哈贝马斯，在主体性研究中有了新的走向：开始把人的主体性存在看作存在的中心和哲学的焦点，借以校正科学主义以物役人的倾向；把主体性理论的重心转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借以纠正只讲人与自然关系的偏颇；提出了人与人之间互主体性的概念，以克服过去过分强调孤立主体性的缺陷；强调被压抑的非理性因素在主体性中的作用，以克服只讲“理性人”的片面性弊病。与东方思想文化相比，西方主体性理论是晚熟型的，而不是早熟型的；是外向型的，而不是内向型的；是征服型的，而不是和谐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因人的主体性问题而兴，又因人的主体性问题而困，其思想上的成败得失，值得我们研究。

第二个源头，就是中国哲学中早熟形态的内向主体性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的主体性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根深蒂固的家族本位和君主专制，因而不讲个人，只有吞噬个人的人伦说教，根本没有人的主体性思想。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历来重心在于人，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是贯穿始终的主导趋势，因而比起西方思潮来，最高扬人的主体性。这两种看法各执一端，都可成一家之言，但又都缺少具体分析，没有真正抓住中国思想的深层脉搏。问题在于，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主体性？这里讲的主体性是什么样的类型？在这里，双重尺度会引出东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主体性理论。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思想中确实没有西方近代以个人为主体的主体性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肯定，中国自有一套带有东方色彩、早熟形态的主体性思想。这种中国式的、早熟型的主体性思想，早在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就萌发了。秦汉之际那种大一统式的、绝对化的封建专制、君主专制，犹如一道分水岭，把中国传统思想一分为二：先秦时期，只有相对的君主专制，因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具有更多的民主性、主体性色彩；秦汉以下，逐步

走向绝对君主专制，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皇权主义的成分逐渐加重，人的主体性思想受到严重压抑。中国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的“早熟形态”意味着提前成熟而未能真正成熟的双重含义，由此决定中国传统主体思想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一是重心不在于人征服自然的外在主体性，而在于人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内在主体性；二是重心不在于外力主宰型的主体性，而在于天人关系、人际关系、身心关系和谐统一型的主体性；三是重心不在于人对自然关系中的抽象认知主体性，而在于人与人伦理关系中的道德主体性；四是并非强调个性独立、个性自由、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体性，而是强调人伦关系网络中的群体主体性。中国传统主体性思想，主要着眼点在于把人理解为“内向人”、“伦理人”。这种以内向型为主的主体性理论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一下子深入到人的主体性的深层本质进行探求，另一方面，又忽视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外部表现——对主体活动对象驾驭关系的研究。这种内在矛盾决定了中国式的主体性思想必然经历一种曲折的历史命运：在古代，这种早熟的主体性思想孕育出早熟的经济、早熟的政治、早熟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超越西方、领先于世的智慧支点；在近代，这种早熟的主体性思想，又使人难以割断中世纪人身依赖关系的脐带，难以走出“自然经济——君主专制——专制文化”的封建制度，难以踏上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在现代，这种早熟的内向型主体性思想，如果能和西方晚熟的外向型主体性思想融汇交流，取长补短，在解决世界历史新型期的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过程中，将会焕发生机，大放异彩。

第三个源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主体性思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文明土壤上，它继承了欧洲文明，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其作了更高综合，因而马克思主义既没有离开欧洲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大道，但又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哲学的传统思潮。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主要有这样的特征：一是在人的主体性